

·甲骨文研究·

专栏导言

黄天树

自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,迄今刚好120周年。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,与流沙坠简、敦煌文书、内阁文库被并称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。两个甲子以来,经过一代代学者的辛勤努力,甲骨学已蔚然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。尤其是王国维先生提出以“地下之新材料”(主要指甲骨文和金文)印证“纸上之材料”(指古书记载)的“二重证据法”,并运用甲骨文解决了殷商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,为甲骨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。

然而甲骨多为残片,要利用它来研究古代的历史和语言,必须首先进行缀合。正确的缀合,为学术界提供新材料,功德无量;而错误的缀合,为学术界制造伪材料,罪莫大焉。因此,验证甲骨缀合是否正确是十分重要的事情。甲骨缀合的验证方法很多,或根据断边、或根据残字、或根据辞例、或根据字体等,在实际运用中,往往是几种方法结合起来综合运用的。如本期“建馆110周年纪念之典籍篇”栏目中胡辉平《国家图书馆藏甲骨缀合勘误二十一例》一文提出,“甲骨缀合最终最准确的检验标准只能是甲骨实物本身”,这个观点是十分正确的。作者在国家图书馆工作,而国家图书馆藏有3.5万多片甲骨,馆藏甲骨数量位居世界第一。因此,作者可以对馆藏甲骨进行实物检验,并取得很好的成绩。此外,个别目前尚未找到对应实物的缀合,作者经检视拓本,再结合字体、辞例和甲骨形态,也可以判断缀合结果是否可以成立。

吴雪飞《谈一版新缀卜辞中的“商人”和“中商”问题》一文利用林宏明的缀合成果来讨论卜辞中的“商人”和“中商”问题。吴丽婉《与商妇相关的两条甲骨史料》一文中的两则缀合都是自己做出的新缀合,从甲骨形态与可以补足的残字来看,这两则缀合都是可信的。吴雪飞认为,卜辞中的“命

商”“伐商”“侯商”之“商”，当为人名或部族名，不是商人自称。这一认识是正确的。另外，作者赞同卜辞中的“商”和“中商”所指相同，可从。但是，作者只引用《合集》20453“于中商乎（呼）御方”，是不够的，应该补引《合集》20450“乎（呼）御方于商”。这两条卜辞字体相同，都是师组小字类卜辞；内容相同，都是“御方”即“抵御敌对之方国”，很可能是同卜一事。由此可见，前者地名“中商”即后者地名“商”。也可以证明“商”和“中商”应是指以安阳为中心的王畿地区。这是因为“方”入侵而到达商的腹地，所以商王呼令“御方”。吴丽婉在第一则缀合之后得到一条完整的卜辞，卜辞中出现“妇辛”这一新的称谓，十分重要。作者联系其他卜辞论证“妇辛”是商王武丁对其死去的配偶“妇好”的称呼，可以成立。涉猎过甲骨的人都知道，“妇好”是商代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，本文为甲骨断代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。作者第二则缀合得到两条完整的卜辞“惠中妇作害”和“惠妣辛作害”，通过“中妇”和“妣辛”的选贞关系，推断“中妇”也是商王室之人，且地位不低。

综合来看，本期刊发的这三篇甲骨文研究文章，或从验证甲骨缀合入手，或讨论文字考释、辞例研究，或考查商代史实，都属于目前甲骨文研究中的热点问题。

古代“金文”之“金”指铜（青铜），后人把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统称为“金文”，实际就是铜器铭文。铸刻铭文的风气，以商周时期为盛，所以狭义的铜器铭文主要是指商周铜器上的铭文而言的。广义的铜器铭文既包括钟鼎彝器铭文，也包括戈剑、带钩、铜镜、货币等铜制品上的文字。因此“金文”不是一种字体的文字：先秦铜器上的文字是大篆；秦汉铜器上的文字是小篆、隶书；唐宋金元铜器上的文字可能就是楷书。据现在所看到的材料，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，最早见于商代早、中期，其时代上限甚至早于殷墟甲骨文。不过，那时的铭文字数极少。到商代晚期，铭文字数增多，最长的有50字。到西周达到鼎盛期时，长文如毛公鼎，多达497字。

与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史相比，金文研究有着更悠久的历史，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代，距今近2000年。《说文解字·序》称：“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，其铭即前代之古文。”到了宋代，由于朝廷提倡，金石之学大盛，对金文的著录、研究出现高潮，吕大临《考古图》、赵明诚《金石录》等金石学史上的名著相继问世。元、明两代是金文研究的衰落时期。清代金石学和小学复兴，金文的著录、研究又得到发展。尤其是到了乾嘉时期，水平迅速提高，学者众多，著述如林。现藏国家图书馆的珍贵典籍《小蓬莱阁金石目》稿本，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黄易（号小松）的未刊著作之一。此书题为“金石目”，实际只著录三代至宋金元时代的金文，共328种，是黄小松藏金石拓片总目之金文目录部分。国图金石组的卢芳玉将该目录首次整理发布，为研

究黄易收藏以及清代金石学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。

与甲骨文相似,金文资料中也存在伪作。比如容庚先生认为,录尊(《殷周金文集成》5419)乃卣之有铭残底而鑲入无字尊内,不排除是估人所为。但容说未得到学界公认。吴盛亚《录尊真伪再考辨》一文,从版本学的角度校勘了该器存世的11种代表性拓本之后,认为容说很可能是对的,这已是在无法以实物验证的情况下所能做的最大的努力了。就录尊的真伪而言,容说是否正确最终仍需通过科技手段进行检测,我们呼吁典藏单位及早公布录尊的X光射线透视照片,以祛学界之疑。

刘卓异《〈殷周金文集成〉师兑簋拓片勘误二则》一文也致力于纠正著录书中的误判。文中通过比对字形指出,《殷周金文集成》4274-2“元年师兑簋”盖铭当是伪作,可备一说。而“三年师兑簋”的三张拓片,其中著录号为4319的第三拓,所有字形、行款甚至间距,都与剔锈后器铭拓片的4318-2号完全一致,推断此二拓当为同一铭文分别在除锈前和除锈后的拓片,结论大体可信。甲骨文和金文都存在校重问题,但二者情况有所不同。甲骨校重就是剔除同一部甲骨著录书中所收的重片。因为甲骨文是刀刻的,如果两片甲骨上所刻字形、行款间距完全一致,就可以断定此两片甲骨是重片。但是,西周铜器是用模子翻铸的,铭文完全相同而为两器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。这是做此类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的。

马晓稳《吴越剑铭拓本考证二则》有两则内容。第一则讨论越王剑A拓和B拓。作者认为,A拓和B拓是同一柄越王剑的两张不同拓本,B拓是由A拓修描而成的。第二则讨论吴王夫差剑。作者从文献中找到一条更早的史料,提供了吴王夫差剑收藏流传的新信息,有其学术价值。

金文研究,离不开对文字学知识、语言学分析等基本手段的运用。比如所谓“一字析书”主要指甲骨金文中把一个字的两个偏旁之间的距离写得过大的现象。这种现象有时会使考释者把一个字误拆成两个字。张乐《说西周金文中的“鬲鼎”》对金文中仅一见的“鬲鼎”一词做考察,由于此器物形不传,学界对该词的解释就很难达成统一。作者认为,所谓“鬲鼎”实乃由上“鬲”下“鼎”构成的“鬲”之繁体,这种写法也见于虢文公子作鬲等鬲形器,因此“鬲鼎”一词所从出的叔鼎器形亦当是鬲而非鼎。这种说法可备一说。而黄锦前《金文夫妻同字称谓释例》一文,研究金文中夫妻同字称谓的现象,而对这一现象的指证,可以确定人物之间的关系,串联起原本看似不相干的一些铭文,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料,很有意义。

目前全世界收藏的有字甲骨大约有15万片,有字青铜器大约有2万件,如果每片(件)以10个字计算,总字数已超过170万字。数量众多,内容丰富,是研究商周历史、语言的第一手资料,弥足珍贵。甲骨金文未来的整

理与研究课题很多,例如:流传经过、辨伪校重、搜集佳拓、汇聚同文、缀合复原、分类断代、编制索引等等。限于篇幅,这里试举两个研究课题来谈谈。

第一、加强甲骨金文字词的考释

甲骨金文字词考释,是甲骨学、金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。因为甲骨金文的字词如果读不懂的话,就谈不上利用甲骨金文来研究商周时代的历史和语言。传统的文字考释强调利用同时期、同地域文字材料考释甲骨金文,该方法在释字上已遇到“瓶颈”,很难奏效。随着近年战国楚简的大量出土,其中蕴含着许多商周以来传袭的写法,为释读甲骨金文提供了一把新钥匙。

第二、加强甲骨形态和青铜器形制花纹的研究

学者研究甲骨金文,多重视文字而轻视研究甲骨文金文所依附的甲骨材质和青铜器,这是不可取的。掌握龟甲和牛骨的形态,不但有助于缀合,而且有利于卜辞的释读。研究金文也一样,只重视铭文而不顾及铜器的形制和花纹,也是不可取的。过去甲骨金文著录书大多只著录有文字部分的墨拓,很少刊布甲骨形态和青铜器形制花纹的彩照,从而影响这方面的研究。随着国家经济实力、照相印刷技术的提高,近年新出版的著录书大多为甲骨金文配备了清晰的彩色图版,大大改善了研究商周甲骨形态和青铜器形制花纹的条件。

甲骨金文,犹如“周诰殷盘,佶屈聱牙”,晦涩艰深,拗口难读,希望通过学者的潜心整理研究,使古奥费解的甲骨金文逐渐得以通读。